

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至暗时刻

清光绪十九年(1893 年)三月,对于身为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来说,注定是相当难熬的一个月。因为就在这个月的 12 日,京师大理寺卿徐致祥上书弹劾张之洞的折子,送到了光绪皇帝面前。

在大清,弹劾一名封疆大吏算不得是稀罕事。有意思的是,这次站出来弹劾张之洞的人是正三品的大理寺卿,一时间朝野震动,张之洞的官宦生涯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石破天惊的弹劾案

徐致祥弹劾张之洞,罪名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怠慢政务,经常不听下属汇报,胡乱安排工作;二是重用恶吏,任用一些昏庸钻营的官员;三是滥耗钱财,以修铁路、办铁厂和开矿为名,到处勒捐;四是架设湖南电报线引起民愤。

徐致祥这次敢对张之洞出手,必定有一定的“舆论基础”。如果说怠慢政务、重用恶吏这两顶帽子在晚清官场是“普适性的”,那么在兴办实业上耗资巨大而收效甚微,就绝对戳中了张之洞的软肋。朝野上下,张之洞在实业方面不计成本的“屠财”行为,在当时早已声名远扬了。就连后来的《清史稿》也评价他“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说白了,就是张之洞喜欢搞大项目,但是往往虎头蛇尾,效益不佳。

以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为例,该厂自始建至投产共花去资金 600 余万两白银,按建厂之初的计划,预计年产铁 6 万吨。然而,直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十一月停产为止,汉阳铁厂实际只生产出生铁 5660 吨,熟铁 110 吨,钢料 1400 吨,铁拉成钢板条 1700

吨,数量少得可怜。此外,铁厂还存在运营中选址欠妥、技术长期滞后、管理有缺陷等问题。

但是,搞大项目、多花钱就是大罪过吗?如果只是这样,那就太简单了。张之洞曾坦言,自己办铁厂、架设电报线等是为开风气,而非牟利。他认为创新就要承担风险,搞大项目,成功了造福国家,失败了权当积累经验,何罪之有?况且,张之洞说得很明白:我不贪!反正办实业的经费没往我自己兜里塞,你尽管弹劾,我不怕!

翻一翻张之洞的履历,他 16 岁中顺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 年),27 岁的他中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一直到光绪八年(1882 年)才外放担任山西巡抚,很明显,张之洞作为一名笔杆子长期在朝廷任职,没有地方任职的经验。李鸿章 40 多岁时已经是直隶总督、封疆大吏了,而张之洞 43 岁时,还只担任一个翰林院侍讲学士的闲职。

作为一个笔杆子出身的官员,张之洞更擅长舞文弄墨,要他真刀真枪地去干实业,未必比他天天骂的李鸿章等洋务派好多少。

光绪帝的难题

徐致祥敢在此时站出来弹劾张之洞,按照当时官场的游戏规则,绝对不是他一个人心血来潮,正义感“爆棚”,他的背后一定是一群人,而且必定有地位相当高的“大佬”对张之洞心生不满。对于这些,光绪帝心里非常清楚。攻击张之洞的几条意见虚虚实实,有攻击工作作风问题的,也有攻击经济

问题的。徐致祥真正致命的攻击还是在于张之洞大办实业,开矿办厂,耗费巨大,觉得张之洞一定有经济问题,要求朝廷对张之洞进行查办。

光绪帝接到这个折子同样心烦,张之洞毕竟是封疆大吏,朝廷里一伙人要借着皇帝之手收拾张之洞,他觉得不好办。张之洞是混迹官场多年的人物,早年得到慈禧太后赏识,在京城是清流党的领袖,到了地方又先后任职两广总督、湖广总督这样的要缺,还积极参与近代化的改革,怎么看都是朝廷倚重的股肱之臣,这可不是凭三言两语就能“撸官”的。毕竟,万一处置不好,张之洞能掀起什么风浪谁也不好说。

这案子既不能交给徐致祥去办,也不能交给与张之洞关系匪浅的李之藻、张之万等清流党“大佬”去办。思虑再三,光绪帝做了一个特别有水平的决定:把徐致祥弹劾张之洞的奏折分抄给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瀚章,让同样段位的两个封疆大吏去查张之洞的案子。刘坤一着重查张之洞在湖广任上的事情,李瀚章则着重查张之洞在两广任上的事情。至此,张之洞处于三面围攻的境地,湖广总督的至暗时刻来了。

刘坤一的决定

光绪帝把张之洞的命运交到了刘坤一、李瀚章手里,同朝为官,二人到底会如何办这个案子?

刘坤一给派去湖北调查张之洞的下属定了个原则——“公事只问是非”,具体的工程细节、经费花销不是他应该管的范畴。说白了,只要张之洞的情

况面上过得去,刘坤一没打算为难他。

政敌攻击张之洞主要是针对他好搞大项目、花销无度,但如果人人揪着这点来兴师问罪,保不齐刘坤一自己也会被人扣帽子。所以,刘坤一对此时的张之洞更多是同朝为官的惺惺相惜。

刘坤一私下对张之洞的心腹透露,他对朝廷的回复,“只就大处落墨”,“若专就一事一物分析辨别,转授人以指摘之端”。连帮张之洞“过关”的策略都想好了,隔着纸张都能感觉到刘坤一在拍胸脯,“决不令香帅有为难处”。于是,本来光绪帝是要刘坤一查办张之洞的,结果刘坤一处处体谅张之洞的为难之处,处处维护张之洞。

说刘坤一徇私枉法吧,他讲的也确实句句在理。为官一方要做事,肯定会得罪一些利益集团,被人揪住一些小问题大做文章。张之洞并不是一个庸官,他确实想有所作为。

但皇帝交办的案件总要有个结果,朝廷里一帮人铆足了劲要打倒张之洞,如果查办的结果是张之洞一点问题都没有,幕后那帮人面子上也挂不住。最终,张之洞同意承认自己在用人方面不察,但是把罪责一股脑推到下属赵凤昌头上。赵凤昌在当时尚属无名小卒,又有谁会关注他的升降?他反而因此备受张之洞器重,被调离湖北。

事件有了戏剧性的反转。徐致祥一伙人兴师动众一番调查后发现,张之洞只是在用人上小有瑕疵,反而更加巩固了他作为洋务运动支柱之一的形象。

据《历史的荣耀:中央帝国的时运、铁血与霸业》历史研习社/编著(天地出版社出版)

姚雪垠与臧克家的三次“笔征”

我的父亲姚雪垠与臧克家相识于汉口大陆饭店。当年风华正茂的他们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他们同孙陵、碧野、田涛等一批知名作家及文化界人士在第五战区开展各项文化活动,为抗战鼓与呼。

1939 年春夏之交,在随(县)枣(阳)会战打响前夕,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协)襄樊分会组织了第一次“笔部队”——由作家临时组成小分队(组),开赴前线采访,通过写作为抗战服务。姚雪垠、臧克家、孙陵各率一支小分队前往随枣前线采访。

他们来到前线,深入战壕,收集素材。第一次随枣战役后,作家们都有不少收获,父亲创作了《春到前线》《四月交响曲》;臧克家创作了诗集《随枣行》;其他作家的作品也林林总总,相当可观。这些作品反映了前方将士的战斗生活,也激励了士气。

两个月后,正值盛夏,文协襄樊分会组织了第二次“笔部队”,远征皖西。这次千里迢迢的笔征之路,历时三个月,作家们栉风沐雨,看一路,想一路,议一路,写一路。其中,父亲写散文,臧克家写诗歌,揭露汤恩伯部在界首的走私活动。他们还到蒙城凭吊在阻击战中英勇牺牲的周元副师长和两千余名官兵,在大洪山访问了新四军办事处,讨论当下的时局。他们每到一处,都会给予年轻人鼓励和指导。

为配合前线部队作战,是年末,文协襄樊分会第三次派出了“笔部队”出征。第一组姚雪垠、安娥等人由京

钟路转汉宜路;第二组臧克家等人去信阳、确山一带。这一次“笔征”耗时三个多月。在这次远征中,父亲在马背上构思了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

父亲一行人的这次“笔征”,是在风雪交加的寒冬中度过的。翌年 3 月从前方归来后,父亲写了散文《人呢》和《神兵》,真实反映了前方士兵令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生活。

父亲和臧克家等作家在历次“笔征”中,与指挥作战的张自忠、钟毅、黄樵松等抗日将领接触多,并成了朋友。这些将领和官兵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为此,臧克家对为国捐躯的将士们有着充满感情的回忆:“随枣战役打响了,钟师长忙于指挥战事,我从师部、团部、营部、连部,一直到山头的前沿阵地。没有多久敌人攻了上来,半小时前我和他们并肩而立的那些士兵全部牺牲了。第二年 5 月,钟毅师长也在战斗中壮烈殉国了。”

父亲对这段经历也有深切回忆:“国民党军队第八十四军一七三师师长,叫钟毅,性格豪迈,有文人气质,会作旧体诗。他热情接待我们,当晚住在师部。夜里附近的枪炮声十分密集,到五更时候钟师长起来,送我们走。他的部队正在顶着敌人的进攻。师部院子里的一株玫瑰正在开花,我们说以后再来时玫瑰花还会再开。没有想到,这是我和钟师长的最后诀别……张自忠将军也在枣宜战役中壮烈殉国了。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千古英雄!”

据《名人传记》姚海天/文

